

慎到浑天说真伪考

陈 兴 伟

长期以来,《慎子》的真伪似乎不成问题,近日研习古代天文学,拜读了一些当代的著述,诸如阴法鲁、许树安(1992)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宣焕灿(1992)的《天文学史》、陈久金(1978)的《浑天说的发展历史新探》等^①,分别称引了一则来自《慎子》的文献资料,认为公元前四世纪的慎到已经提出“天体如弹丸,其势斜倚”的观点,并且确认这一观点是我国古老天文学“浑天说”的萌芽。慎到果真“以浑圆的天的概念否定了天是半圆形的传统看法,并以为天有南、北二极,且绕极旋转”^②,而“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③吗?在现存的古代文献里,我们看不到任何有利的证据。通过梳理《慎子》的版本源流以及与引文相关的部分,获得的主要认识是,人们在引证历史文献的时候,缺乏一种必要的审慎,甚至完全没有防范真伪的问题。这种现象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否则难免受到伪证的困扰,有损科学研究的严肃性和准确性。

一、版本系统

现传的《慎子》版本,可以分为两个系统。元明之交陶宗仪的《说郛》本、明万历中周子义《子汇》本、清代的《四库全书》本、嘉庆中张海鹏的《墨海金壶》本、据《墨海金壶》本增

刻的《守山阁丛书》本、据《守山阁丛书》本排印的《四部备要》本、《丛书集成》本、《诸子集成》本、《子书百家》（后更名为《百子金书》）本、影印《子汇》《守山阁丛书》本的《慎子三种合帙》本等等，同属于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可推《守山阁丛书》本为其代表，卷末载有钱熙祚的跋文，跋云：

《史记》称慎到著十二论，徐广注云：今《慎子》刘向所定，有四十一篇。按《汉志》本四十二篇，徐注一字误也。《通志、艺文略》：《慎子》旧有十卷，四十二篇，今亡九卷三十七篇。是宋本已与今同。《群书治要》有《慎子》七篇，今所存五篇具在，用以相校，知会本又经后人删节，非其原书。今以《治要》为主，更据唐宋类书所引，随文补正，其无篇名者，别附于后，虽不能复还旧观，而古人所引，搜罗略备矣。旧本后有逸文，不知何人所辑，内有数条，云出《文献通考》，今检之不可得。且郑渔仲所见已止五篇，安得《通考》中尚有逸文？寻其文句，盖杂取《鬻子》、《墨子》、《韩非子》、《战国策》诸书。以流传既久，姑过而存之。

跋语要言不繁，略尽其概，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发现。

另一系统源出于明人慎懋赏的万历刊刻本（简称慎本），陈乃乾的《慎子三种合帙》之一即影印此本。常见的《四部丛刊》本、《诸子百家丛书》本均从江阴缪荃孙辑校的《藕香簃》藏写本，而《藕香簃》藏写本据民国孙毓修的《跋》语，“盖从明万历间吴人慎懋赏刻本钞录者”，源流无别。“其书分内外篇，内篇三十六事，外篇五十事，较《四库》本、《守山阁》本均不同。”孙氏以为此本高出它本，实是好奇者言，不足为凭。因为此本不仅与《四库》本、《守山阁》本不同，而且与《汉志》以来的记载不合，事出蹊跷，难以信赖。而上述三文所据的本子恰

恰属于这个系统，它的可靠性由此可见一斑了。

二、浑天思想的来源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好古的国度。在这样一个传统里，如果慎到确实提出过“天体如弹丸、其势斜倚”的观点，后世居然漠然处之毫无反应，那是不可想象的。何况浑天思想的成熟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直到魏晋六朝人们还在反复论难。所幸的是，慎本伪撰的并非只有称引的两句，而是一篇长长的十分有序的理论文字。通过它我们可以追寻作伪的材料来源或历史线索，从而澄清事实，去除虚妄。现将全文依次分解如下：

1.天地既判，而生两仪，轻清浮而为天，重浊凝而为地。

按：引文颇重体系，先以宇宙创生之说涵盖全文，语近《淮南》和《灵宪》，实乃杂揉而成。《淮南子·天文训》说：“虚霁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灵宪》说：“有物浑成，先天地生，……盖乃道之干也。道干既育，有物成体，于是元气剖判，刚柔始分，清浊异位，天成于外，地定于内，”类似的表述也见于班固的《白虎通德论》、《黄帝内经》等，很有道家和易学的色彩，这是古代中国自然科学的一个学术特点。不过作伪者擅长天文却短于易学，在“天地既制，而生两仪”上犯了一个错误。“两仪”源出《周易》，本指天地而言，作伪者不明于此，竟成天地而生天地，甚为可笑。

如果单从语言着眼，引文用“轻清”一词替代《天文训》、《黄帝内经·阴阳应象》等汉代文献中的“清阳”，个中的信息已经提示，慎本成文的年限至少迟在宋代以后。“轻清”一词出现在公元六世纪，用于宇宙创生理论不会早于宋代。朱熹曾说：

“地者，气之渣滓也；所以道，轻清者为天，重浊者为地。④”

这一说法后世流传极广，连《三国演义》第八十六回也说：“昔混沌既分，阴阳剖判，轻清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行文风格最相接近，细细捉摸，恐怕是意味深长的。

2. 天形如弹丸，半覆地上，半隐地下，其势斜倚，故天行健。地北高，故极入地三十六度；南下，故极入地三十六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按：此段论述天体图式，这一图式源自于通常认为张衡所作的《浑天仪注》以及三世纪的王蕃的《浑天象说》^⑤，或说是两者的综合，读者自可参阅。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中国文化史》、《天文学史》和《浑天说的发展历史新探》里所见到的引例均非伪托的原文，出于什么原因，一时不得而知。

3. 昼则自左而向右，夜则自左而向右。天依形，故运行太虚冲漠之际而无停；地附气，故束于劲风旋转之中而不坠。

按：把大地想象成悬浮于无限空间（太虚）的球体，原属古代论天三家宣夜说的内容。作为一个宇宙结构体系，宣夜说代表了一种历史的进步，因而渐渐地融入了浑天说的构架。张衡认为天球大圆之外还存在无限的空间，《黄帝内经·五行运》：“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冯乎？大气举之也”，便是宣夜说的早期的反响。关于这一点，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宋代哲学家张载“地在气中”的著名论断，不过引文的直接源头不是张载而是朱熹。朱熹曾说：“天以气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气。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尔。天以气而运乎外，故地樞在中间，岿然不动；使天之运有一忽停，则地须陷下。”^⑥引文显然是朱子语录的提炼和加工。

不仅如此，根据李约瑟博士的提示，南北宋时期的邵雍和朱熹常常提到支持天上日月星辰并使之运行不息的“刚风”，这一概念流行了若干个世纪，直到明代陈霆的《两山墨谈》，仍然称

宇宙之风为“劲风”或“刚气”。引文不用“刚风”而用“劲风”，成文的时限至此基本上可以明朗化了。

4.气积于阳，而其精外明青谓之曰；气积于阴，而其魄含景者谓之月；体生于地，精浮于天者谓之星。经星则丽天而左行，日月则违天而右绕，譬蚁行磨上，磨左旋而蚁右行，磨疾而蚁迟，故不得不随磨而右旋焉。

按：这一段最可注意的是“蚁行磨上”这个有趣的比喻，它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撰修于唐代的《晋书·天文志》。这个比喻的雏形是王充创造的^⑦，主要用以解释日月与恒星相对的反方向视运动，属于盖天说的系统。

5.曰经千里，昼夜所经，谓之一度。仲夏跃东井而去极近，则昼长而夜短；仲冬耀南斗而去极远，则昼短而夜长。春秋二分，曰临于卯酉，星昴宿则跨赤道，昼夜平分而中停。

按：此层讲述太阳的二分二至点^⑩及其与天象、昼夜长短的关系。“仲夏耀东井”、“仲冬耀南斗”两句化自于《吕氏春秋》，《仲夏纪》曰：“仲夏三月，日在东井”，《仲冬纪》曰：“仲冬三月，日在斗”。从天象上说，公元前四世纪的颛顼历测得冬至点在牵牛初度，公元85—89年，贾逵测得“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⑧，这是71.6年岁差一度的结果，也就是说，颛顼历所的天象是当时的实际天象。慎子活跃于稷下，几与颛顼历同时，天象当依颛顼历为是。就算牵牛初度已经密近南斗，作伪者还是犯了一个难以掩盖的错误，先秦“南斗”单称一“斗”，冠以“南”字已是《史记》的时代了。

6.月如银丸，受日之光。月魄承日，故明为所蔽而日食。日有暗虚，故阴为所射而月食。日之行也舒，昼夜行一度；月之行也疾，昼夜行十三度。日月之会是谓食。

按：研究月亮的形体、月光的来源，日月交食的成因，并且

形成正确的认识，现存最早的文献记载不会晚于西汉。公元前一世纪后半叶的京房说：“日与星辰，阴者也；有形无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师以为日似弹丸，月似镜体。或以为月亦似弹丸，日照处则明，不照处则暗。”^⑨说明师承已久。东汉张衡集其大成，影响后世甚巨，引文参用的便是张衡的阐释系统。

7.日盈而月缩，则后中而朔；月盈而日缩，则先中而朔：

此段内容涉及中气、日月运动的不均匀性（盈缩）与“朔”的关系，这是隋朝天文学家刘焯才得以完成的认识，慎到何能知之？

8.舒前速后，近一远三，谓之弦。相与为衡，分天之中，谓之望。以速及舒，光尽体伏，谓之晦。

按：此段一字未改、完全袭自《后汉书·律历志》下。

好了，我们用不着再一一分析后续的关于历法以及天气寒热的详尽论述了。通过以上八个层次的追踪，我们已经看到慎本所提供的天文知识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天文学所有的基本要素，是一个融盖天、浑天、宣夜三家于一炉的综合体系。作伪者谙熟中国古代天文发展的概貌，在文献材料的取舍上可谓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作伪者过度追求体系的完美，恨不得将中国古典天文理论的全部精华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岂止“浑天说的萌芽”一话可以了结？

三、作伪的作者、年代与动机

可以肯定，慎懋赏的万历本是一部十足的伪书。没有迹象表明作伪的年代会早于万历年间，作伪者很可能就是慎懋赏本人。

由于资料的限制，慎的生平一时无从追考，只能暂付阙如。不过慎本刊于万历年间这一事实，隐隐让人感到一种张扬国粹以与外来文化抗衡的焦虑和冲动。李约瑟博士把公元1600年视为

《中国科学技术史》写作规划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从那以后一批充满宗教热情的耶稣会传教士远离欧洲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古典天文学以及先进的测量仪器，与古老的中国开始了对话和交流。而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萎靡不振的时代，由于皇家长期的禁锢和保守，朝野上下几乎没有精通天文的人才，在中西文化第一次正面冲撞的浪潮中，中国便明显地居于劣势的地位。这种状况自然会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应，引起前所未有的耻辱感和危机感。在这种耻辱感和危机感的驱动下，“一件没有料到的事情

耶稣会传教士的参与，不久就传得中国人重新发现了他们自己的固有文明在明代衰微之前所取得的成就。^⑩”可以想象这种重新发现所具有的对抗目的。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时期在中国的纪年史上恰好是明末万历年间。

也许是巧合，但实在是太巧，因此我们有理由把它视为危机压力下的一种隐蔽性的对抗反应，历史上不乏托古而见重于人的例子，慎懋赏选中濒临失传的《慎子》，应该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不过这一推测能否成立，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不管怎么说，作伪与慎懋赏决不会没有关系。

注：

①陈久金（1978），引自上海科技出版社《科技史文集》第1辑。

②③阴法鲁、许树安（1992）《中国古代文化史》第3册1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④⑥《朱子全书》卷四十九。

⑤《晋书·天文志》上。

⑦王充《论衡·说日》。

⑧《后汉书·律历志》。

⑨⑩引自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一分册136页、第四卷第二分册692页，科学出版社。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